

漢字性質的思考

高桂惠教授：

傅教授說今天的議題非常有趣，是他個人的挑戰，我對他這次的講座，尤其是漢字解讀這個部份，也非常有興趣。因為我最近教同學讀書的時候，發現同學閱讀能力真的下降了。我只是在教現代小說魯迅、郁達夫，同學卻說聽不懂，文字沒有辦法「吃」進去，我告訴同學要去「咀嚼」。傅教授到臺灣來唸書時，可以選擇念研究所，但是他非常有心地從大一開始念，所以大家會發現他的國語很「臺」，不是北京腔，是非常道地的臺灣腔國語，據說他有時候還可以夾雜一些閩南話，所以絕對沒有聽的困難，對我們一些外國同學是很大的啟發。今天時間很寶貴，就請傅教授帶給我們一些閱讀、細讀的示範。

傅熊教授：

各位先進，各位同學，今天在此不做細讀，要講的題目主要在於基本概念問題以及概念的探討脈絡。在此希望各位能由普通的思考圈跳出，從比較廣泛的範圍來窺看今天的主題，使我們得以重新面對某些一代一代沿襲下來的觀念，使大家有機會換個角度來了解被傳統所肯定的一些看法。

無論由內或由外試解文化現象，均可清楚地認出中國文化中具有代表性和象徵性的東西與觀念。一般每個人都會同意長城本是一個中國與中國文化的代表物，筷子和中國文字亦均為明顯的中國象徵物，我的老師和同事們都認為它們最具中國代表性。在無數的案例中，不勝枚舉，但今天只列舉此二者：筷子與文字，正視這些物件，我一直問自己，它們能「中國」到什麼程度？若用如此的傳統方法來看待文化，知識份子用它們來觀察自己的文化或異國的文化，這是不是合適的做法？其實如此簡易的觀念、中國的形象和文化的代表物，都已經轉換成民間對一個文化的遵循。由於缺乏健康的批判距離，所以逐漸形成民間宗教信仰團體形態的了解方法。

談起筷子，本人數年前在孔廟做報告時曾引用了一位西方學者對《周易》古代註解的理解，有位老先生問：「你要了解中國的古代哲學，為什麼要引用一個西方人而不引用一個用筷子吃飯的人呢？」老先生所謂「用筷子吃飯的人」應指中國人。此句話中的文化民族歧視（cultural racism）我雖置之不理，但有兩種角度可以深思：若去四川鄉下問一個農夫（他保證用筷子吃飯）對周易古代的註解有何見解，試問會得到何種答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若非要問「用筷子吃飯的人」，便連孔老夫子都不能問，因為眾所皆知當時人們不用筷子吃飯，孔老夫子也不例外，他用手吃飯。當時雖有筷子，但不是扒食用具，而是用來取湯中之物。

說到文字，多次探尋類似上述問題：現今文字被利用為討論文化代表物的口號，其重點並非在於文化、歷史，而是政治。如此而言，代表物背後則都是有功能的：政客們將這些代表物宣傳為政治

口號，社會人士不斷地被洗腦，便勇往直前地跟著口號走。所謂的文化代表物被利用為解決國家認同問題的工具，同時也建立了某群體的意識及其定義，並劃分群與群之間的差異。如此而言，文化代表物首先牽連到某群體的認同感問題，而不以此群體的文化、歷史為重點。換言之，文化代表物大多數還有一個很明顯的重要作用：它們被當作是一種提倡中國獨特性的工具。文化歷史方面的解釋已不著重正確或不正確，惟有達到政治目標方可罷休。中國文字的討論方法也依然如此，文字的實質常被拿來強調中國及其文化的獨特性，其文字則被描述為獨特，與其它世界上的文字系統迥然不同。以中國的愛國精神來宣傳自己文字的虛構傳說（myth），並以井底之蛙的視野將中國文字與拼音文字對立而論。

其實分析文字性質的專科學問早有它悠久的歷史，不過歷史研究並非簡易之事；在此複雜的探索過程中，中國傳統建立了一套理論，西方傳統也有它的一套理論。自明朝中西文化開始進行學術交流時，那些對中國文字感到興趣的歐洲學人，幾乎全靠耶穌會士從中國傳至歐洲的消息來源來建立他們對中國文字的認識與了解。當時歐洲思想家依據傳教士所述的虛構傳說（myth），重新再加了另一層虛構傳說。久而久之，一層層的累積了歐洲對於文字的虛構傳說，以此設定了一般歐洲人對中國文字與其他異國文字的認識與模式。

若今重新思考，將其理論化，本人認為漢字的基本性質問題極為重要。換句話說，漢字到底為何物？它有一些什麼功能？它與其他文字別的書寫系統是否有差別？如果截然不同，其不同點又如何立論？提起此問題及探討方式，學者們容易陷入已設定的陷阱。有

人缺乏或拒絕對自己的文化保持距離感，或內心覺得因某種文字實屬自家文化，便認為唯有自己文化群之人，方能真正地理解它。此態度所導致的趨向就是將學術的考量放一旁，而信口開河或盲目的跟從舊說。在這種討論文字的環境裏，重點在於將漢字描述為 pictograph。Picto-與 picture 同根，pictograph 則是「圖案文字」。無論將出發點設定在中國或西方文化背景裡、老師授課或學生學漢字時，幾乎都會接觸到一些「好玩的說法」，來引證中國文字與圖案之間的關係。不過真正的問題是那些圖案故事與解說在教學中何有益處、有何害處？

如果是討論「圖案文字」，首先必得下一個定義，什麼叫「圖案文字」？圖案文字的基本特質就是它應該很像它所代表的東西，原則上它是一個圖案（picture）。到某個程度它應該是真實的，見圖見字。可做個簡單的試驗：一個不曾學過分析「圖案文字」、不知如何「讀」它的人應該很自然的認得出圖案所代表、所指之物。這樣的話，如果能認出圖案所代表的意思，它就是圖案文字。這就是說此類文字必須是“sufficiently pictographic to allow a person to know their meaning just by looking”。若無法認出，就不應該算「圖案文字」。若畫一隻鳥或一棟房子，如能識出，就沒問題。但是我們看中國古文字，此案例實恐不多，中國現代所用的漢字，無論繁體或簡體字，更無需一提。研究傳統文字學的同事們常強調古字的圖案性，不過，沒學過現代漢字或古字的人很難以其形而知其義。換句話說，連古字早已經過抽象化，使其所謂圖案性早已無法傳達其義，令讀者無法以其形去猜其義。

學生初觸漢字，當老師用圖案解釋漢字時，學子自然而然會認為可以觀圖案而曉其義。但老師還沒告訴他們之前，誰能認出古字的含義？假設中國古字是圖案文字，則根本不用學它，應可用看漫畫方式，從圖案看出一個故事。所以，圖案文字性質的基本條件應該可用看圖說話的方式來了解它，無需經由學習。提到漢字與漢語的教學，最近在海外提供漢語課程的學校越來越多。學漢語的學生在美國大約有八千、法國大概四千、英國也差不多三千五到四千五、德國有三千。大學本科學生一年級約要學八百到一千字、共同外語課性質漢語班的學生大約只學三百到六百字、大部分大學本科所定漢語教學目標為頭兩年應該學一千八到兩千字。學了兩千字左右之後，幾乎所有的大學便開始訓練學生做初步研究。所學漢字的數目少於一二年級的密集語言訓練，而大學部畢業生所學過的漢字難以達到三、四千。多數在海外參加漢語水平考試的學生，均選擇參考比較低或中等水平，因為參加比較高等的漢語水平考試大約需要兩千九百字和八千八百個詞（words），所以參考高等漢語水平考試的學生寥寥無幾。兩千九百字和八千八百個詞的要求，雖然在漢語教學的環境裏聽起來水平相當高，但與學德語、法文、西班牙語的歐美學生相比，恐怕海外提供漢語課程的學校對學生的訓練遠不及其他外語教學的要求。由此可看出，大部分在歐美學漢語的學習效率、所達到的水平，並不理想。據統計，在大陸閱讀普通文章、日常文獻、報紙等等，需要認三千字左右，在臺灣則需多一些。在中國大陸小學生一、二年級所學為一千八到兩千字。臺灣的小學生頭兩年年要學兩千一到兩千兩百字，三四年級就得學一千八到三千。

理論上，教育界對中國的小學生和歐美的大學生所定的學習目標一致：四年之內至少要學三千字，以便閱讀日常文獻。那為什麼中國的小孩做得到，西方的大學生難以達到？其實原因很簡單：中國小孩開始學寫字時已會說漢語，僅需學基本識字。就閱讀能力而言，以母語者，易達到較高閱讀水平。西方大學生需要學一個新的外語，包含發音、文法、句型、詞彙等等，並得讀、寫、記，需要較多的學習精力。此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差別就是年齡上的好處：中國小孩年紀小，大學生已超過學語言的年齡。直接地說，在統計中可查出國內外學生的識字能力，可以得知識字超過兩千字的外國學生不多，而大多數國外中文系畢業生的閱讀和寫作能力不如中國小學生的閱讀和寫作能力。

初步漢字教學方法中，無論國內國外，大多數老師所強調的就是以所謂圖案文字為主題，以增進學生對漢字的好奇感與興趣、加強記憶力和減少對漢字的距離感。此教學方式有它的利弊，雖激發學生的學習能力，但因基於錯誤的觀念將漢字當作「圖案文字」解說，恐會誤導學子。若持續用此種傳統教學方式，唯恐錯誤觀念將永無止境地延傳世代。

無論語言教學或語言研究，其基礎應是普及語言學（general linguistics）。若普及語言學真是普及的工具，應可用它來研究任何語言的理論脈絡，漢語也並不例外。若漢語實為例外，普及語言學就不算是個普及的工具而需修正。一般普及語言學中有部分值得可疑的觀念是經由歐洲傳統所形成的，不過因普及語言學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與學術的進展而發展，所以提倡的語言研究理論脈絡並非「天

理」，可改之。普及觀念將人類文字分為三種，其一為「圖案文字」。問題是何時引進此觀念？有何根據？如何定義？

根據對埃及文當時的理解與經由傳教士介紹漢字的資訊，早期歐洲學者建立了「圖案文字」的概念，並使之進入語言學隧道。傳一傳百，眾所皆知，理所當然，真理永傳。當時歐洲的哲學家非得依據耶穌會傳教士對中國的了解與宣傳不可，各類書中提倡漢字為全世界「通用文字」(scriptura universalis)，認為漢字中「一圖」代表「一意」(idea)，更認為漢語的發音不重要，可隨區域而變，唯獨「圖案」傳意。漢語是否可使用為此類世界通用文字的說法，當時引起了震撼與爭論，有人提出了質疑，如果漢字是圖案，一字一意(idea)，那也意味著一個新的 idea 需要一個新的圖案。後來，歐洲知識份子聽說中國讀書人需要許多時間學漢字，便覺得耗時，因為同樣的時間可學習好多國語言和專業。

其他的一些思想家，譬如研究歷史的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5)在《歷史講義》中曾討論過中國歷史，認為中國的文明早已停滯發展，並以語言角度來闡明他的說法。黑格爾將中國文明比喻成埃及的木乃伊，外表富麗堂皇，裡面卻毫無生機。重要思想家所提倡的觀點，影響力悠遠流長，許多後代學者更以其觀點角度了解、針對、看待中國文化與文明。無論其說法是否正確，對任何以自我為中心來探討異鄉文化歷史的研究方法，均產生了莫大的刺激。另外，他的研究方法和結果對那些用外來觀點看待自己文化之思維方式的人引起了反思作用。歷史記載中的中國文化與文明的發展趨向對黑格爾的論點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假設其

論點不成立，為何其他許多來自中國的消息又似肯定他的說法？若實如黑格爾所評論，中國傳統文明與文化是處於停頓發展的狀態，那麼一些傳統文人與其他保守分子越強調傳統，越強調要跟古代一樣，此類心態是否越肯定黑格爾的論點？另一德國思想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87-1835）在他的語言學研究中，將中國文字與思維方式並為一題，探討語言文字與理性和感想之間的關聯後，語言與思考方式之間的關係成為語言學和心理學等等專科的重要研究趨向，並成為討論中國文化的研究方法之一。在日本教哲學與政治經濟學的美國籍教授 Ernest Fenellosa（1853-1908）和美國大名鼎鼎的海外詩人 Ezra Pound（1885-1972），曾在中國文字方面下過一些功夫，以其賣書號召力，他們的觀點糜爛於（欣賞家）名流社會裏。冷靜地看待他們對中國文字的瞭解，不得不承認他們將中國文字當成美學方面的研究對象，唯恐其理論無理，跟中國文字似乎無關，而是跟他們的想像力有密切關係。其論點雖然不足以採信，但影響力極為廣大。由於許多思想家對中國文字有特異的觀念和自己虛構的一些了解，在此種情況之下，學者與民間對漢字的了解是越來越迷糊。近代法國大哲學家 Jacques Derrida（1930-2004），對漢字僅有皮毛之見，毫無了解，卻用漢字來針對他所謂以邏輯為中心的西方思考方式，鼓吹一些過於簡單化的中西文化對立謬論。但因為他是個受重視的思想家，跟著他唱這齣戲的人不少，所以在各種學術作品中均可見到他對中西不同思考方式的見解之影響。

此類天方夜譚的論點不僅限於西方世界，中國的文化語言學也可算其例之一。以中國獨特論來肯定國家認同感，是將文化語言學

建於「語言文字沙文主義」(language and script chauvinism)的架構上。若要跨文化討論自己與異鄉文化圈，沙文主義便是巨大的障礙，建立於沙文主義的論點則是有害無益。這種障礙物令人幾乎無法心平氣和地來討論漢字的性質，一聊就變成敏感話題，一談就離不開政治、國家觀念、文化認同、沙文主義、簡單化的中西文化對比。首先要知道中國文字代表中國文化獨特性之類的口號，這就是形成文化沙文主義的要素之一。

眾所皆知，中國傳統以形、音、義為準則來論漢字，將廣義的文字學分為狹義的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就漢字的字形而言，現代漢字與大多數古代漢字均已無法分辨漢字是由圖案構成的，只能視為非圖案文字。在此加註，傳統文字學的研究範圍與本人所談的重點只有間接關係：中國傳統文字學講[形]的來源與字形的發展過程，我想討論的並非古字或字形史、辭根學等等，而是現代人閱讀現代漢字的一些問題，見形不見字，與古字無關。

就音而言之，所謂圖案文字的音有何標準和根據？據普及語言學的定論方法，先有語音，才有文字。先有傳義「馬」的音與詞，後有傳義[馬]的書寫符號，最早書寫過程中是否畫了一匹馬與現代漢語所用[馬]字的關係，不在我今天討論的範圍之內。普及語言學認為先有詞而後有字是語言文字的發展過程，由此可見漢字原先大概也代表語音的基本原則。先有語言才有文字的發展路線，導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漢字以其組成部分表其音。俗話說秀才讀半邊音，也就是有邊讀邊。換之，大多數漢字屬於表音系統文字(phonetic script)。我為什麼這樣說呢？平心而論，出土文獻與手抄本中常碰

到一些所謂的錯字。所謂錯字也就是說部首改了，但代表音的部分未改。由留傳下來的出土文獻與手抄本的文本，可窺見重音不重部首的運用文字狀況，重音不重形的使用原則，也就表示出漢字的表音功能，在書寫過程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上述為所謂的「錯字」，加上漢朝的學者與作家多偏於重音的書寫，重音又加部首的書寫方式，將相當普遍的字添個部首，此舉擴大了漢語的詞彙範圍。

就形而觀，出土文獻與手抄本的所謂錯字與異體字的解釋方法有待討論。假設把異體字當成錯字，是亂寫的，那又要依據何種準則來改正它？是不是那個時候寫字的人有一種差不多思想？用一種隨便的心態？當時寫字的標準較為鬆散？某詞當形容詞、名詞或動詞時，其字形不完全一致的現象，是否此類異體字跟它詞性與文法作用有密切關係？還是這些異體字裡有我們不明的規則？

綜上所述，是否要重新考慮漢語及其文字也屬表音系統。既然表音文字與拼音文字，均以語音為主，雖拼法不一，但原則一致，則何謂中國文字獨特論？

以下，換一個角度探討所謂圖案文字與非圖案文字的閱讀方法。前幾年在德國舉辦過一個關於閱讀中文方法的研討會，發現古代漢語跟閱讀有關的詞彙及其閱讀原則跟其他文化與語言的發展過程非常類似，也討論過將漢字視為「圖案文字」及其閱讀方法。所面臨的關鍵問題就是漢字與其它文字的閱讀方法是否一致？若有所不同，該如何解釋？研究出讀者讀漢字的方法與過程，可以利用腦科醫學來理解人腦如何處理漢字的方法。從十九世紀開始有人研究

頭腦：原則上，人腦分左腦、右腦，各半腦所處理的訊息不同。大多數的人是在左腦處理語言和邏輯思維，因左腦也是分析思維的中心，所以學者認為其與語言、邏輯和分析有緊密的關係，而右腦負責處理圖案和感想。左右半腦對立，則引申到語言和圖案、理性思維 (rational thinking) 和感想思維 (intuitional thinking) 的針對相像。

經由測腦方式來研究閱讀的程序，本用來觀測西方語言的閱讀方式。有人提倡漢語不用拼音文字而用「圖案文字」，其閱讀方法必然不同，應由右腦處理。由此觀點延伸到另一個文字天堂，認為中國人因多用右腦，其思考方式是獨特的。根據此說法，西方人大多數重用左腦思考，較忽略使用右腦，導致西方人的感想較弱，其邏輯思考較強。因為頭腦將漢字解說圖案以右半腦處理，中國人的右腦比較發達，所以導致其邏輯思維較弱，感想較強。此類說法，意義何在？雖是一種很膚淺的中西文化對比觀念，但不可否認它在某些情況下卻有其存在的利用價值。其實這種觀念早已泛濫成災，無論西方人還是中國人所寫的、西方學生或中國學生所學的教科書、漢字入門，此類教材中處處可見。更有人認為漢字本來是經由左右腦處理，雙半腦相應互和，顯示出漢字是「圖案文字」與拼音文字的不同一性。

從六七十年代起有人測試人們閱讀漢字的方法，所得結果是人腦在讀漢字時將漢字當做詞 (words)，處理方式與其它語言類同，是經由左半腦。雖研究與測試結果至今已有五十年，不過教科書、民間說法、甚至於一些學者的了解，仍以老套的文字沙文主義和漢字獨特論為主。其實這是科學的測試結果，自然而然和一般搞思想史的人的思維與分析結果不一樣：對思想史的看法不同，則有待討

論。因為幾十年以來所測試出的結果很難去否定它，更有人盡量將一些舊有觀念與測試結果配合起來，提倡另一個測試結果的分析方法，認為因漢字多分表音和表義的組成部分，所以左半腦便處理它的音，右半腦處理它的形。此說法目的在於折衷兩種互相對立的論點，在理論基礎上仍堅持將漢字視為「圖案」。

在某些特殊狀況下，左右雙半腦是可同時進行收集訊息的互動。初學者首先會用右半腦來分析字形，探測其意，但這只發生在初學者閱讀單字（isolated graph）的情況下。初學者先試以右半腦閱讀上下無其它字的單字，此認字過程是否與漢字的傳統解釋方法有關？是否與傳統教學使用圖案論來介紹漢字有關？初學者是否從第一次接觸漢字時已被圖案論洗過腦？當「圖指物」發生困難時，右半腦會換到左半腦尋求資訊。簡而言之，只有在這特殊情況下使用右半腦解讀漢字，普通閱讀與右半腦無關。讀句子或句子的部份時，左半腦將單字組成詞，在此過程中漢字被解讀為符號，左半腦中的處理方法則與其它語言一致。若真如此，是不是應該跳出傳統對漢字錯解的框架，重新看，再次認識漢字？是否是現代化文字學的首要研究工作之一？是不是要開始接受幾十年以來測試的結果，建立一個符合普及語言學的漢語與漢字基礎架構？如批判的審查結果無法在普及語言學的原則上建立漢字理論，是否應進行普及語言學修補研究？不過此重責大任必得完全基於純粹學術論點，擺脫掉沙文主義與自我觀點和政治因素的成分，方能以平常心來重新認識漢字與其它文字的真正性質。不論西方人所作或中國人所作中國學，其任務不限於認知分析中國的研究，當務之急在於將中國方面

的學問駛進較為普及的專科學問，提倡較理論化的研究結果，以便導入跨課門跨區域的討論與研究脈絡，漢學或中國學應該對此再下功夫，勿將中國的語言學和漢語語言學視之為特例。

演講就此結束，大概已經有許多反對本人的愚見與引例，所以今天預留較多時間和大家討論。我曾試求較好的答案，漢字性質問題應該如何處理？在此想說的是 I don't have the answer。我選了這個敏感題目，是誠心期望往後可以看到此方面理論較踏實的研究。在此跟大家淺談一些觀念，希望可以引起一些比較新的、比較大膽的研究傾向。

高桂惠教授：

這是非常精采的一場演講，充分展現了歐洲學者的風範——雖然傅先生是奧地利人，但在英國學界服務。我看著傅先生就一直想到羅蘭巴特，他們不僅是一樣地帥，也一樣地深思明辨。傅先生重回到中國古典的文化現場來思考，從筷子的使用，讓我們反思到底去找誰來問這些語言跟文字在現場的作用？然後從西方傳教士對明清中國的轉介，建構出西方對中國的理解。不管是從哲學方面黑格爾，或是從生理學、文化政治學、社會學、現場教學、科學的再實驗或是對傳統的陳說，傅先生都提出了反思和質疑。最後傅先生也對中國、尤其是文字語言都還相當的自由，沒有被政治意識形態所設限的臺灣學界提出邀請：在這樣的學風、學術情境之下，我們可以做什麼？

在座有很多漢語研究的同仁、同事及學者先進，對於傅先生丟出來的反思有沒有什麼回應呢？同學們也可以提出問題。

提問者：

傅教授，老師好，各位同學好，我是國教所的同學，我現在教的是國中生，所以對於剛剛傅教授所提的，學生在學習漢語上遇到的問題，我作一些經驗上的分享。國中我們教到六書時，會說：「象形指事為『文』，會意形聲為『字』。」教科書中說「文」是不可分析的，我們老師會說那是天才、有慧根的人才可以理解的。而會意跟形聲字，則是可以分析的，所以就有形符跟聲符。課本裡講說百分之八十的字是可以分析的，相對映證了傅教授所說。國中升高中的基測也考過一個題目：創造一個字，問那個字可能要怎麼念？我想就是運用這個邏輯。但我們在教書現場遇到的困難是：學生雖然認識字，但發展到到「閱讀」其實是另外一個障礙。他認識了很多辭彙，逐字都看得懂，但加在一起就看不懂了。以我而言，學英文時查了很多單字，卻還是看不懂整篇文章，所以是不是人在學語言的時候受到很多文化的因素影響，了解辭彙到對應文章時本就會有一些問題？所以對教授所提的有沒有普遍的語言學，我還是打一個問號，我是從自己的實際經驗去反省。

我想要請問的是，我們現在可以找到什麼資料對於辭彙或是詞、句子理解，然後到一篇文章的理解，也就是單字詞彙的「懂」

然後到可以「應用」，這些方面可以看哪些書，或是哪些學者正在做相關的研究？這是我好奇的部份，謝謝！

傅熊教授：

譬如說靠認識單字，不見得看得懂一個句子，這是日常生活中常會碰到的事，最明顯的是讀古代文獻，那就代表對字的認識不夠。習慣上我們常強調某人的認字數量，對我而言這個方法是完全錯誤的，認識多少個字是次要的，當然兩三千個字是基本要求，假設有個人告訴我他懂得七千三百六十七個字，我想這無法證明他的閱讀能力很強，主要的是我們必須要認識詞，一個詞在文法上有什麼作用？根據句中的詞性功能它能代表什麼意思？當然語言是跟文化並行的，不過有時候大眾心目中的傳統文化與實際傳統文化是有差別的，面對此類的文化形象只能小心的考察。況且現代人對古代日常生活的細節的注意力不足，容易產生錯導。例如說在書中讀到一個故事：很久以前某人從某處走到另一處，請問他穿了什麼鞋？走什麼路？路況好不好？行李是自己扛還是有僕人代勞？一首詩、一句話、從哪走到哪，有何含義？此類景、物、事不容忽視，在做研究時最大障礙就是那些小細節，所以看電視或電影對古代的認識是不可靠的，更不可以用自己的想像力來猜測古代事宜。其實古今之間的代溝，中西所面臨的困境原則上是大同小異。

說到閱讀，我想要先瞭解妳是在尋找什麼樣的資料？

提問者：

我想知道教學的時候要怎麼幫助學生從認識字、詞，到了解整篇文章？就好像一直在加強學字、學詞，句子反覆覆誦，可是該如何增進他的閱讀能力？我們的教育中這方面好像比較薄弱。說有沒有什麼方面的部份可以加強老師這方面的教學能力呢？

傅熊教授：

我不知道有什麼捷徑可以走，恐怕傳統的學習方法，勤勞讀書，還是比較實際的辦法。

提問者：

今天很高興聽了傅教授精采的演講，也讓我們對於中國文字的認識有一些反省。文字學中象形還有圖案化的問題，其實在學術界並不太多的爭議。因為在漢字學上，比較熟悉的學者譬如大陸的裘錫圭先生，其實早已將象形文字或者形音字、形聲字等等歸在亦音文字裡，所以大家不會再把它看成純粹的圖像文字或象形文字。

剛剛提到一個問題，對於漢字我們是把它看作圖案還是拼音文字這些觀念，中文系二年級以上的同學都不難了解，因為文字發生必定是因為跟符號、跟語言配合，它絕對是在左邊，不會是在右邊，

因為你一看到把它認定為字時就是在左邊，所以也不存在圖像在右邊的問題，只要你把它看作文字絕對就是語言。

傅熊教授：

我說的右邊左邊是指左右半腦，不是漢字結構。

提問者：

可是認定它的時候，在腦袋裡「文字」一定是放在左腦，除非像您所說，將它看作「圖像」，才會在右腦。所以傅教授的論點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您也提到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我們把文字當成是一個工具的話，要發展「普遍的語言學」，更早之前西方曾經提出過一個看法，就是「要不要發展世界語」？其實以中國為例，我們考慮發展「普及的文字學」會比「普及的語言學」更有可能性。

中國之所以沒有像北歐分成那麼多小國家，就是因為統一了文字，統一了文字的作用在於說用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一樣的文字，剛剛提到一個問題就是語言的複雜性很大，尤其在中國境內，方言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單是廣東裡就有各種不同的方言——廣東話或是廣土話，可是文化卻沒有一個區隔，原因就是文字是統一的。談到統一文字的問題，我們要往前面再看，傅教授提到一個觀點：為什麼在出土文獻、典籍裡面有很多寫法跟後來不一樣？主要是戰

國到漢代的發展過程裡形聲字的發展，各式各樣造字的可能性都出現了，亦音文字便是其中一例，文字還沒有形成固定的形式，它的結構他的意義都還在發展，所以會造成這樣的情況。

今天非常高興能聽到傅教授的意見，我也想聽聽您認為對於當年世界語沒有成功的原因是什麼？今天我們推動「普及語言學」有沒有一些困難？有沒有可能發展「普及文字學」？例如畫一個烏龜，大家都認識它是烏龜，只是可以用不同方式去唸，陝西人可以用陝西音唸，臺灣人也可以用臺灣音唸，這是漢字的一個好處，如果從這個思路去想，是不是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做法？

傅熊教授：

我當然也讀過裘錫圭先生對傳統「六書」觀念的新解說。重點是很多錯誤的觀念在民間一直很堅持地被傳下去，這是不是表示大眾的教育脫離了專家所研究出來的結果，還是繼續講那些石化的觀念，這問題令我相當擔憂。

另外，我也常聽到中國沒有被分裂成許多小國的原因，是因為文字，這個說法是不通的。全歐洲現在還用一樣的文字，ABC 不是嗎？以前全歐洲也有過一個共同的語言，當時所有讀過書的歐洲人均可用拉丁文來溝通。我想文字不是主要原因，有共同文字還是無法進行有效的日常溝通，主要的溝通工具得用嘴巴。識字的人在中國傳統社會裡佔有多少的百分比？恐怕少之又少，所以你把文字當

作整個中國的觀念，我覺得是用政治的方式來解釋。中國的領土如此龐大，在中國旅行從省到省就猶如在歐洲旅行從國到國，食、衣、住、行和說話等等方式都稍微不一樣。請試著想一想，義大利話與西班牙話這兩種語言其實都可以溝通，主要的問題是歐洲思想史裡曾發明了一個有害的概念：民族主義（nationalism）以及其所引起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歐洲政治史就因為它而死了許多無辜的人、打了許多無謂的戰爭，到最後這個概念還造成了現今很多莫名奇妙的現象，我覺得就是歷史過程不同。中國這幾百年有強烈的統治者，不過之前也曾分為許多國，所以我想文字不是統一中國的原因。

講到世界語言，有關所謂世界共用文字在此推薦您讀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與其他支持此烏托邦思想的人的作品，就可發現他們所提倡就是世界文字，讀他們的著作時，要注意到當時的人對此建議的反應，該說的都已說過，這條路可行性不大，除非回歸到以畫圖案的寫作方式，一棵樹就是一棵樹，但是松樹和橡樹間還可以指出種類，可是所有針葉的樹該如何分類？圖案所能表達的是相當有限的，在原始社會它的表達功能尚可，但社會在衍變，現代生活環境恐怕已經太複雜了，圖案的表達功能已經不足以使用。

提問者：

我可以回應一下，漢字為什麼從單音節變成雙音節或多音節？因為本來就不容易用象形字去發展一套純象形的文字，所以才會有這樣的發展。至於您剛剛提到世界語的書，我大學時就看過了，那

時候甚為流行，文字界學那時對世界語的討論非常熱烈，可是後來沒有成功，沒有成功的原因我們也都了解。您剛剛提到普及語言學要不要推行，我就想到當年這件事情，它不可行早可預見，請問您若從這個角度趨勢想解決辦法，哪些部分我們可以解決，哪些部份需要重新考慮？我是從這個角度向您請教。

傅熊教授：

我想對漢字的了解需要進一步的理論化，而且必須要能把它用英文表達出來。不以英文為母語的人都比較吃虧，但若要影響到國際學術界，非以英文為工具不可。所謂進一步的理論化，就是必須達到踏實的普及語言學水平，也就是要積極的考察傳統對漢字與世界各個文字的一些觀念。雖然一直有人把中國文字當成圖案文字，在專家肯定漢字非圖案文字之後，可以依據中國語言學、小學，改正錯誤的觀念。不過，關鍵是要很積極地與普及語言學人才在合宜的理論基礎上進行討論與溝通，方能將錯誤的觀念推翻而建立較正確的理解，我想這應該是可以做得到。

提問者：

漢字裡頭既有表音也有表義，不需要做絕對的分析。那我們提出用「語素文字」，運用在對外漢語教學裡，對國際上已具備一些語

言學概念的學生來說，既不違反中國人對漢字的認識，也可以適當地對外介紹漢字，在這個觀念下是不是能夠幫助他們理解、學習？

傅熊教授：

我們應該是用比較正確的教導方式來培育新的一代，無論國內或國外的教育界都面臨到同樣的施教政策問題。

對外漢語教學在中國是個熱門課程，我一直都提醒從事這方面教學的朋友，國外的漢語教學經驗是不容忽視的；譬如說我們倫敦大學教授漢語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對外漢語教學這門課在中國還是相當新的課程，他們有他們的一套理論，但不要忽略我們也有我們的一套。再加上去，早期漢語教學有些東西是非常有意思，那些還保存著的明朝漢語課本、明清的傳教士在中國學漢語所用的課本，對歷史語言學的研究是非常寶貴的資料。當時所編教材中以拼音方式記錄當時某些地方的發音，可窺出區域性的發音特色，由其用詞方法可看出歷來漢語辭彙的變化。

什麼叫語素文字我不知道，反正以便國際學術界通用的專業名詞恐怕得有個恰當的英文詞，也需要下一個達到語言學基本標準的定義，若只是發明新的辭彙和專有名詞，則幫助不大。專有名詞非有學術型的定義不可，正如國際植物學一樣，所有的植物都有拉丁文的名字，在植物學的世界裡拉丁文就是「世界語言」。如果要修改普及語言學裡對漢字的認識，必須要用共同的辭彙和定義。首先

真正的挑戰在於把它理論化，其次是如何將它表達出來。教學方法與理論只有間接關係，它應是跟著理論進行的。授課中若可以避免畫圖最好，若無法排除，只好把它當好玩，無論如何就是要避免此類錯誤觀念不斷地延續。

提問者：

傅教授您好，很高興聽到您演講，我想這也是這些年來學界在反省的事情，以前太強調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因為太強調差異，也就阻隔了中西兩方的溝通。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講，我們現在想要找一種共通性，好像跟西方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這樣強調共通，會帶來什麼？真正能促進雙方更進一步了解嗎？我們在強調「通」的時候，「通」裡面應還是有差異性，只是我們比較的觀念比較澄清了、能夠接受異質了。可是在我們強調「通」的時候，對促進東西方的了解到底是什麼？

另外，一兩個小問題，譬如國大陸的簡體字，簡化的標準很多，有從「音」省略，譬如我們講「麵包」的「麵」他跟「面」容的「面」是同一個字。但最近看很多中國大陸出的書，漢字的由來，雖然強調圖畫云云，但社會上所執行的卻是簡體化的那套東西，我覺得有點納悶。

英國最近好像也要把太長的英文單字簡化，有很多字太長了，可是發音不需要那麼長的字，所以希望把字簡化。這也是我很好奇的一件事。

另外以前看學生寫論文，一般的人容易有「分中西」的觀念，有些學者說西方的寫作是沿著「大前提」、「小前提」、「結論」下來；中國的寫作則是螺旋形的，但看中國更古老的一些文章，譬如《道德經》，先說明「道可道，非常道」，然後再講述道是什麼，這又是符合邏輯的，可見中國也有邏輯性文章。可是我看學生在寫東西時又真的很混亂，沒有那套邏輯性，請問這又是為什麼？

傅熊教授：

我百分之百讚同你對所謂中西文化間差異的感受。若非要講中西比較，請問什麼叫做西方？你是指芬蘭、義大利、西班牙、美國西部、美國北部、都市還是鄉下的地方？它們是有極大的差別，千萬不要將它們簡單化的說為一體，在這情況下只會增加它的困難度，使中西兩觀念變得無法操作。就中國而言，問題大同小異，中國北方和南方差別也相當大。若硬要比，常也搞不清楚是在比什麼。都市文化與鄉下文化不分，人們是否接仍接受傳統的價值判斷，若以簡化的比較方法，此類現象則難以搞清楚。若說一群是以個體或個人主義為主，另一群是以群體或家庭為主，恐怕也是過於簡單化的胡言亂語。若看上海，臺北等都市裏的生活方式，恐怕早已與西方的都市很像。若看鄉下地方，義大利南部或其它一些歐洲鄉下的生活中，沒有家庭的人不容易立足。這種情況之下，我總認為較有內涵的中西比較難以進行。

說到邏輯，我非常欣賞《韓非子》，書中之語非常直接了當，文章與邏輯結構不拐彎抹角，很適合我這個「日耳曼民族的思考方式」。

說到簡體字，我認為簡體字的問題非常大。雖然自古以來中國就有簡體字，但繁體字卻在教學方面面臨很大的危機。英國幾乎所有大學已經放棄了教繁體字，現只剩三所大學還繼續在教繁體字：牛津、劍橋、亞非學院。我個人覺得這種趨向很可惜，因放棄繁體字的學校就等於限制他們自己學生的閱讀能力，只能讀最近五十年來出版的作品，而將中國歷史縮減到最近五十年，這是件可悲的事。

講到簡化，認為歐洲的語言是拼音的概念，亦有問題。大部分歐洲語言中某詞的發音及其拼法還是有差異的，譬如說英文的「排隊」拼為 queue，其音如 q。從其拼法的結尾可看出 orthography 與發音之間的關係並非簡單。假如 orthography 直接記音，他的拼法應該是 q 罷了。歐洲語言中 orthography 與發音最密切，拼出來的音最接近於發音的是義大利話，英文是最不規則的，這是跟語言歷史有關，英文比較早就定下 orthography 的規則。德國最近提倡了改革 orthography 的運動，搞得烏煙瘴氣，國家要定較為簡單化的 orthography，但沒有人理。學校裡新的拼法自然是硬性規定，但報紙媒體反對新的拼法，仍繼續用舊的拼法標準。由此可見，國家實無權力硬性規定此類標準，政府只能對學校施加壓力，希望有機會培養出新的一代使用新拼法標準。Orthography 也不過是約章（convention），國家欲定 orthography 的權力來自哪裏？其實這個問題臺灣也在掙扎中，爭論臺語的字該怎麼寫時，教育部公佈所謂臺語常用字的標準寫法，不過好像沒有幾個人遵守他們的標準，愛怎

麼寫就怎麼寫，大家看得懂就好了。這就是標準化和所謂正確寫法與實際語言應用三者間的衝突。您提到臺灣學生的閱讀能力越來越糟，這讓我聯想到我們的英國學生，英文也是拼得一塌糊塗。

提問者：

傅老師您好，我前幾天也來聽老師的演講，這兩天的演講讓我第一次見識到西方的學者思辨問題的過程，在反覆不斷的詰問當中獲得那種樂趣，這和我以往的學習是不太一樣的。老師剛剛提到這種漢字和圖像文字、西方拼音文字的差別，我想到在上文學理論時，老師提到過索緒爾的語言學談到「語言的規約」。我們同樣是東方人，用華語溝通，因為我們有共同的規約。西方人自然也有他們語言共同的規約，因為有共同的規約所以能夠溝通。我想到聖經裡巴別塔的故事，為了不要讓人們建成高聳直上天際的高塔，所以讓彼此的語言不通，而老師現在做的工作乃是希望重新連結東方和西方。

我知道老師大學就讀於臺大中文系，想請教在這樣的求學過程中，老師常常有機會接觸到中西學者的論著，有時候我們只是想表達一個共同的真理，或是談一個共同的東西，歸結同一個結果，但因為用了不同的思考、不同的語言，所以在表達的過程中會有非常大的不同點，可不可以請老師分享一下，在求學歷程中面對這種漢字的思考、拼音文字的思考，老師有沒有什麼樣的想法？

傅熊教授：

請你不要把我當成一個什麼西方學者的代表物，我只能代表我個人而已，有不少西方同事的想法和我不一樣。「中西」的事情我討論了二三十年，麻木了，疲倦了，聽煩了那些所謂中西比較的論點，不管講文化衝突或其它話題，我都聽膩了，到最後看不出有什麼差別可言。中國學者、西方學者我只認得出兩種：好的跟不好的，兩面都有好的，兩面都有糟糕的。我也看不出來為什麼一個中國學者對某一個問題要有不同的思維方式，衡量時以個體為主較佳，不是以中西對立的立場。西方學者可以用中國的研究方法，中國學者可以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方法論本來是跨區域的，它不屬於某國家而是全世界的。坦白地說，那些跟著學術潮流（fashionable research methods）來定研究方法的人，我不知道他們研究方法是怎麼定的，說他們是異國人或外星人也無妨。但是用「中西」兩觀念來解釋這些差異的路綫是不通的，到最後研究方法是由研究對象和研究目標的個體決定。語言本來就是一個工具，雖有各式各樣不同的鏈子，全都是用來打、釘。它是一個工具，不是我們的思考，若用不同的語言來表達出一些想法或哲理又何妨。

高桂惠教授：

我們非常感謝傅教授跟我們分享他外星人的想法，這幾年我有機會到東南亞跟美國去看華語教學，有一段時間參訪了發明自然輸入法的公司，他們最近在推動一個聽說讀打寫計畫。那時我就在想

到，每個地方都會碰到大陸派過去華語教學的孩子（譬如泰國或越南），大學一畢業就過去，只要四千元就可以請一位，回來就跟同學說，大陸的孔子學院派越多越是華語的災難，加上現在逐漸電腦化，學生在學習華語時可以選字，使用聽說讀打寫。我們所謂的正體字，在辨識度跟精密度也許有他的優勢，但是現在大家都在推行簡體字，這樣的一窩蜂的學習對華語不知是否為災難？而我很慶幸劍橋大學等優秀的學校還是選擇正體字。

今天非常感謝傅教授為我們展現了歐洲學者對於文化人跟思維很深沉的思辨歷程。也非常感謝傅老師送給我們系辦兩本他的著作：關於鍾嶸詩品的一些研究。感謝傅教授帶給我們一場思辨的盛宴。

